

童 辅 弼 著

论孙冶方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论孙冶方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董辅初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武汉

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董辅初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北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5625印张 75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279·7

定价：0.6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论述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作。

本书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过程，叙述孙冶方和苏联索波里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比较他们的异同。

本书用图解的方式对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了概括、清晰的描述，较详细地论述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特点。书中还对孙冶方的治学特点作了扼要的介绍。

本书可供经济理论工作者、大专院校经济、经济管理专业师生和经济管理部门有关人员在学习和研究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参考。

目 录

一、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
二、孙冶方和索波里的理论比较, 之一:	
相同点·····	(10)
三、孙冶方和索波里的理论比较, 之二:	
相异点·····	(26)
四、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图解·····	(43)
五、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 之一:	
革命性·····	(51)
六、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 之二:	
实践性·····	(73)
七、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 之三:	
科学性·····	(91)
八、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有待继续探	
讨的难点·····	(103)
九、孙冶方的治学特点点滴·····	(119)
后记·····	(139)

一、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的形成和发展

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56至1958年。这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时期。1956年以前，孙冶方同志在上海和北京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实际问题有了广泛的了解。虽然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早在三十年代就卓有贡献地从事经济理论工作了，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应该说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应苏联中央统计局的邀请，他率领中国国家统计局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这次访问对于他的理论活动，对于他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有两个背景：

第一，到1956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苏联、东欧等国以及在我国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显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但是也遇到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经济效果差、经济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等等。寻找适合各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已经提上了日程。在中国，因为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短,问题的暴露还不甚突出,还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孙冶方同志从几年来的实际经济领导工作中,对这些问题则是有了了解的。这次访问苏联,苏联的同行向代表团介绍了苏联统计工作和经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仅苏联存在,中国也存在。这样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在苏联、在中国都存在呢?显然,这绝非偶然。它们是同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分不开的;它们的存在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远不完善,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对它进行改革。而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又是同特定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不开的。要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批判传统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然,在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对问题看得象现在这样清楚。但是,非常可贵的是,孙冶方同志凭他对实际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理论上的深厚根底以及高度敏感,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已经提出计划体制、财经体制的问题了。

第二,错误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来已久,人们敢于去怀疑它们、批判它们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重新进行思考,那还是在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在人们批判了个人崇拜以后。的确,在斯大林同志的晚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

已经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并作了不同于过去的论述，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流行的“唯意志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完全适合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等等。这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是，有些问题斯大林同志仍然没有解决，有不少问题他还没有涉及。他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外，排除于生产资料的运动以外，就是一例。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人们敢于对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重新考虑了。我当时正在苏联作研究生，亲眼看到那时苏联经济理论界活跃起来了。孙冶方同志访苏时，向代表团接谈的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B·A·索波里，长期从事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对苏联统计工作、计划工作以至全面的经济情况了解很多，他不仅向代表团介绍了苏联经济中存在的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例如，经济理论中的“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总产值指标的弊病，利润指标的意义和作用，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政策，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否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固定资产的无形损耗，折旧率过低和技术进步缓慢，等等。索波里的理论观点受到孙冶方同志的赞赏和推崇，给了孙冶方同志不小的影响，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孙冶方同志在回国后发表的

第一篇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后记中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苏联同行“屡次提到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而且给了我们许多精湛的说明”，并指出，特别感谢索波里“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他还自谦地说：这篇文章中所讲到的有关价值规律和计划统计工作的一些基本见解都是在考察时拾自苏联同行的“牙慧”。^①

1958年上半年，孙冶方同志邀请索波里到中国系统讲授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索波里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理论观点。在讲课期间和在各地访问期间，他们经常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交换看法，这对孙冶方同志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有作用的。

上面提出的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关系，并不能贬低孙冶方同志的理论的意义和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创造。只要我们对他们两人的理论观点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就可以看到，尽管两人在理论上有不少一致性，但是，由于孙冶方同志在理论素养上根底深厚，洞察力远为敏锐，所以他以后在理论上的成就是索波里所望尘莫及的。许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索波里从理论上已经触及到了，但他却不能象孙冶方同志那样从理论上深刻地系统地把握它们，他抓到了不少具体问题却不能象孙冶方同

^① 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第37—38页。

志那样前进到从总体上提出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这样一个高度。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叙述。

第二个阶段大体上是1959年至1964年。这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深化和系统化的时期。这段时期，有这样几个历史背景：

第一，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们是孙冶方同志一直批判的“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恶性发作的结果。钢铁产量一年内翻一番的任务的提出，完全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大炼钢铁中不惜工本、不计效果、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否定等价交换，对农民进行无偿剥夺，都同价值规律的要求相违背。1958年实行权力下放，试图解决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混乱，而企业却依旧处于无自主权的地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泛滥起来的“左”的经济思潮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使孙冶方同志更加坚信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更深刻地感到必须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全党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针对当时的实际，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以及计件工资问题。以后，在于光远和孙冶方同志的倡议下又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核算问题和经济效益问题的三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孙冶方同志积极参加了这些理论活动，并逐步使自己的理论深化和系统化。1959年

他写出了重要论文《论价值》，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这篇论文标志着他的理论活动进入了深化和系统化的阶段。以后，他又陆续写出了三篇重要的内部报告：《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在这些报告里，他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理论观点并提出改革财经体制的许多重要主张和建议。

第二，为了系统地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号召读书，其中包括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组成了高级干部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班。孙冶方同志参加了其中的一个。之后，党中央又组织一些地方和单位编写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孙冶方同志领受了编写一本的任务。他主持并组织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我们从上述《论价值》一文可以看到，他在这篇论文中已经提出了以他的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就是“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基本上应该按照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程序来研究，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①这实际上就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的框架。在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过程中，孙冶方同志进一步把他的理论深化和系统化了。接着他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系统的讲授。可惜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论》，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能够完成。

第三，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我们开展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他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就遭到了一些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但是，在1964年以前，一般地说那还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从1964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他的批判已经越出了学术讨论的轨道，变成政治性的批判了。即使这样，正如孙冶方同志所指出的，那时，“只要你敢于坚持你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还允许你发言，

“尖锐的批判还是环绕着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所以，推动我较深入地去思考问题，对我个人以及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是有帮助的。”^①的确如此，不管是学术讨论也好还是政治性批判也好，都促使孙冶方同志深化和系统化自己的理论。他自己深知，对论敌提出的一个个批评，不能就事论事地回答，而必须用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去回答，才能在论战中取胜，如果没有一整套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那是很容易被论敌找到突破口使自己的理论大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以下所用版本相同，不另注明）

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268页。

厦倾覆的。在这个阶段，孙冶方同志在深化和系统化自己的理论中写出了许多论战性很强的文章和发言稿。此外，还应当指出，在那激烈的斗争中，在那“左”的思潮泛滥的岁月里，孙冶方同志为了同当时批判的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他自己也难免受到某些“左”的思潮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此，近年来，他自己已经作了自我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直到他逝世。这是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的阶段。打倒“四人帮”以后，为害已久的“左”的经济理论受到了系统的批判。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试验和推进。十年动乱时期，孙冶方同志在身陷囹圄的七年中并未停止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思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篇章，义无反顾地要为构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厦而献身。十年动乱中“左”倾路线猖獗，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使人们逐渐认识了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打倒“四人帮”后，孙冶方同志在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下活跃于理论战线上。他的理论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有些观点和主张已被党和政府所采纳。这个阶

段，他除了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以外，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更加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他对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如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问题、生产力问题、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等作了新的探索。他针对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同时也对自己的理论观点中某些不正确的部分作了自我清理。这一阶段，他的理论成果是丰硕的。可惜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终止了他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活动。

二、孙冶方和索波里的理论比较

之一：相同点

上面我们曾经谈到孙冶方同志同索波里之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对孙冶方同志同索波里的几次理论交往我有所了解。1956年，孙冶方同志率中国国家统计局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央统计局，我参加了一部分翻译工作。1958年，索波里应孙冶方同志的邀请来华系统讲授国民经济平衡问题，孙冶方同志让我参加了一部分工作。1960年，苏联出版了索波里的《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概论》一书，孙冶方同志嘱我将书中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观点摘要整理成一个材料。这本书由一些同志和我共同于1962年翻译出版。为了研究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我觉得，我应该就我所知把他们两人的理论的异同作一初步比较，供大家参考。孙冶方同志在狱中写的《我与经济学界的一些人的争论》（1972年3月）说：他的有些见解“是接受自苏联经济学家索波里的。这是我在自己一篇文章中特别声明过的。因为这是一个做学术研究工作者的起码的道德”，“但我并不同意索波里的所有观点，即以价值论来说，我的思想比他的系统化多

了。”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以下的叙述可资证明。

首先，让我们看看，孙冶方同志和索波里在哪些理论观点上是一致的或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一致的地方大多是孙冶方同志从索波里那里吸收的。但是，孙冶方同志在每一点上又都独自地进行了广为展开和远为深入的论述。这里我不想涉及许多细节，只想就主要的方面谈谈。

他们两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主要的共同点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理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识。他们两人的理论，在苏联和在中国都是很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也都受到不少人的反对。^①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是站在同一的立场上同两种对立的观点斗争的。

一方面他们反对“自然经济论”，即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自然经济、实物经济的理论。这种“自然经济论”在苏联的二十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我们将在后面谈到。

^① 例如：康·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商品货币关系》，三联书店1963年版。这本书是专为批判伊·马雷舍夫：《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社会计算和价格》（三联书店1962年版）和索波里：《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概论》（三联书店1962年版）两本书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观点而写的。

他们两人认为，“自然经济论”的影响很深，始终没有根除。孙冶方同志指出：这种理论是“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看作是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即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部落经济中，全部生产、分配和消费都为部落的首脑所支配；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了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领导着全社会的经济活动”。^①索波里也说：“自然经济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只有实物计划，而劳动的分配应该大致上采取半世纪前俄国的偏僻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多数农户中的那种分配方法。”^②“自然经济论”认为，无需计算劳动消耗（社会必要劳动量），无需对费用和效果进行比较，否定价值和价值诸范畴的存在。

另一方面，他们两人又反对“商品经济论”。他们把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全民所有制内部还要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或具有商品性的理论称为“商品经济论”。孙冶方同志和索波里都认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从单一的全民所有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60页。

② 索波里：《关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报告》，第一、二、三讲报告提纲，第25页。这些报告的提纲和记录曾于1958年铅印成册，但未出版发行。